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保卫马克思

[法] 路易·阿尔都塞 著

商务印书馆

欲
乎
知
知
PDG

L. Althusser
POUR MARX

Paris, 1973

本书系根据法国马斯贝罗出版社 1973 年版译出

EG09/01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译者的话

路易·阿尔都塞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法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曾先后发表了《孟德斯鸠：政治和历史》（1959年）、《保卫马克思》（1965年）、《阅读〈资本论〉》（1965年）、《列宁与哲学》（1969年）、《答雅恩·莱维》（1973年）、《自我批评材料》（1974年）、《立场》（1975年）等论文集。《保卫马克思》是使作者一举成名的代表作。该书在出版后不到十年时间内（1965—1973年），曾先后十次再版。在理论兴趣比较薄弱的法国，一部进行抽象论证的哲学书，竟比畅销的小说还受欢迎（畅销的小说一般再版三次），这是少见的。此外，该书业已译成英、日、德、意、西等国文字，具有世界的影响。这里，我们想介绍一下作者的生平，并着重谈谈《保卫马克思》一书的主要论点。

路易·阿尔都塞于1918年10月16日生在阿尔及尔近郊比曼德雷小镇上，1924—1930年在阿尔及尔上小学，1930—1936年在马赛读中学。接着，他花了三年时间为报考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作准备，1939年7月通过会考，入该校文学院。就在那时，德国法西斯人侵法国，阿尔都塞应征入伍，随军驻守布列塔尼半岛。不到一年时间，即在1940年6月，他不幸被俘，关在德国集中营内，直到1945年5月才重获自由。长年的虐待和折磨使他精神上深受刺激，后来他多次出现的精神失常就是那时种下的病根。1945—1948年间，他在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就业于加斯东·巴歇拉尔的门下。在结束学生生活后，他留校任教，直至1980年11月16日，因精神病发作，于晚间将妻子勒死，被送进精神病院监护。

阿尔都塞于 1948 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在党内并不担任重要职务,最初只是默默无闻地参与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他成名以后,由于他的观点往往同法共领导相左,他受到相当大的压力,法共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一些领导人(最初的罗热·加罗迪,后来的吕西安·赛符)恰恰是他的论战对手。一些与他有合作关系的著作家先后被开除出党(例如艾蒂安·巴里巴尔、雅克·朗西埃等)。

《保卫马克思》是一部论文集,收集了作者 1960—1965 年间分别在不同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粗略地看,这些论文题材很不集中,有的是书评,有的是笔记,甚至还有一篇剧评。文章使用了一些从别的学科借来的新概念(认识论断裂、总问题、多元决定等),创造了一些新术语(理论实践、理论反人道主义等),因而晦涩难懂。也许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特地为该书写了两篇序言,一篇着重介绍写作的政治背景,另一篇叙述他的研究结论。这些结论可以概括如下:

1.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确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

2. 通过这一断裂,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清算了以往的哲学信仰,从而创立了一种新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

3. 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断裂前为意识形态阶段,断裂后为科学阶段,而意识形态和科学恰恰是对立的。

此外,作者又提出了一种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方法,即他在同期发表的《阅读〈资本论〉》一书中公开提出的所谓“症候阅读法”,或者叫批判的阅读方法。他主张要象马克思批判地阅读英国政治经济学著作那样来阅读马克思自己的著作,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来批判和审查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个个别结论。

阿尔都塞提出的研究结论和阅读方法似乎只涉及学术的领域；可是，出人意外的是这部著作在政治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书出版不久，就被抢购一空，知识分子（特别是法共的党员知识分子）中议论纷纷，法共主办的各个刊物保持沉默（不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过了一年，即在1966年3月11—13日，法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阿尔都塞的两部著作（即《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法共总书记瓦德克·罗歇、政治局委员雅克·杜克洛和艾蒂安·法戎在会上点名批评了阿尔都塞。问题并不直接涉及以上介绍的研究结论和阅读方法，而仅限于阿尔都塞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在五十年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天主教神学家（卡尔维神父、萨特等）就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找出一些人道主义论述，用以反对阶级斗争的口号。而到了六十年代，随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和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人道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苏共中央提出了“一切为了人”、“全民党”、“全民国家”等口号。在法共党内，当时正考虑同具有天主教倾向的工会组织结成“统一阵线”，而人道主义正可以成为连结双方的一根纽带。此外，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也是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的一次很大的冲击，对法国党则尤其如此。一大批知识分子党员，包括一些著名的活动家（如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负责人之一伊夫·法奇）在内，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信仰危机，纷纷退出了共产党。面对资产阶级宣传机器掀起的反共浪潮，留下的党员思想动荡不定，他们为无法解释斯大林时代出现的种种触目惊心的事件而深感苦恼。于是，人道主义便成为一个简便的理由，人们用它来解释一切，指责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似乎所有的坏事都要由斯大林个人负责。当时法共的政治局委员罗热·加罗迪发表的一些文

章，正是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来批判斯大林。他指责斯大林摧残人的尊严，压制人的自由，又强调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等。但是，阿尔都塞认为，不能用“个人的心理”去解释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错误，换句话说，追究“个人崇拜”的原因不能着眼于斯大林个人的品德或作风，而应该认真分析出现错误的“真实条件”，即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意识形态条件和理论条件。他在《保卫马克思》的序言中直截了当地说：“有些人不仅把斯大林应负的罪责和错误，而且把我们自己的失望、错误和混乱，统统推到斯大林的身上。”这句话当然不是无的放矢。为此，他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角度，指出人道主义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口号，而不是科学的概念。在他看来，马克思只是在认识论断裂前，即当他还信奉费尔巴哈时，才是人道主义者，而在他清算了以往的哲学信仰后，他在理论上已经与人道主义相决裂。阿尔都塞并不完全否定意识形态的价值，他认为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策略口号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

与批判斯大林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到理论工作的重要性，这也正是《保卫马克思》的另一个中心论题。在阿尔都塞看来，斯大林教条主义在法共党内的盛行，其原因不在斯大林本人（相反，作者指出，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有一些“精辟的论述”），而主要由于法国党理论传统的薄弱。他指出，广大党员长期忙于政治运动，不研究理论，因而只能“或者人云亦云，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盲目信仰，或者被迫信仰，再不然就是尴尬地装聋作哑，绝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一些领导人不但不阻止我们沿着‘左’的理论斜坡滑下去，相反使劲把我们朝这条路上推”，因而使大家处于“糊涂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法共基层党员对法共领导的不满情绪。阿尔都塞认为，批判了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并不能就此万事大吉，更重要的任务还有待去完成，即是要对马克思的学说从

理论上作出科学的解释。在他看来，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公开以哲学面目出现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它最初属于康德和费希特的总问题，而后来则属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对于这些意识形态的著作(即非科学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去批判，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命题(人道主义、历史主义等)同科学命题混淆起来。此外，在马克思的科学著作(如《资本论》等)中，辩证法还只是以实践状态出现，马克思从没有写过一部关于“辩证法”的著作，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要把以实践状态出现的辩证法上升到理论。他肯定了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矛盾问题上的理论努力，试图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两种不同辩证法的关系，如果用“颠倒”、“外壳和内核”来说明，那只是一种不甚确切的比喻，而不是科学的回答。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公式，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点是把矛盾看作是具体的、内在的、有结构的复杂整体，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把矛盾看作是抽象的、外在的、单一的简单整体。他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在任何事物中必定有一个主要矛盾、在任何矛盾中必有一个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指出了矛盾结构的不平衡性，并用“多元决定”的术语来概括。他认为矛盾的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矛盾的转化，决定了矛盾是一切转化的动力，这就同黑格尔辩证法中量转变为质、否定的否定等概念对立了起来，因为前者(不平衡规律、多元决定)是实在的和具体的，后者(量转变为质、否定的否定)则是思辨的和抽象的。

我们以上概略地介绍了《保卫马克思》一书的主要论点和政治背景。但我们还没有谈到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的关系。评论家们普遍认为作者运用了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从反应来看，也是毁誉参半，有人说这是“闯开了一条新路”；有人则认为这是“日益精巧地伪造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本人在他的《自我批

评材料》(1974年)中,曾修正了自己的一些提法,承认自己把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思辨地对立了起来,对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作了理性主义的解释,从而犯了“理论主义”的错误。他也承认“同结构主义术语的‘调情’超过了所能允许的限度”,让“结构主义这只小狗……趁虚而入”。但是,他极力辩解,矢口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声称这是一场“误会”。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认为,阿尔都塞同结构主义不是没有关系的。这里,我们应该看到,在六十年代西方世界中风行一时的结构主义思潮主要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论,这种研究方法对于语言学这些没有阶级性的科学有一定的价值,并得到广泛的应用,而对于哲学这样具有强烈党性的学科就只能导致纯思辨的推理,也就是说,导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一种理论实践,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一种政治实践,辩证法在其中都只是以实践状态而出现,都不算是真正的理论工作。照这么说来,真正的理论工作就只有他自己从书本到书本,进行纯思辨的推理。这正是结构主义带来的必然恶果。但是,在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上,在对矛盾问题的分析上,阿尔都塞尽管带有形式主义的色彩,毕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果用结构主义这顶帽子一言以蔽之地加以全盘否定,也许并不公平。何况,他在《自我批评材料》中已对以上论点作了局部修正,重申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

译者不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对这位引起众多争议的哲学家难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只能作以上一些客观介绍,但愿本书的出版能为学术讨论提供原始素材。考虑到作者对自己的观点后来有所修正,译者把《自我批评材料》这本小册子(1974年阿歌特书店出版)一并译出,作为附录附在书后,供读者比较研究。

本书系根据法国马斯贝罗出版社1973年版全文译出,并请

杜章智同志参照英译本作了校订，但在重要的理解问题上一概以法文原版为准。该书各篇论文在表达方式、体例等方面有某些不统一之处，译者遵照作者的意图，也不加更改。本书翻译过程中，蒙胡祥熊、王锡君、周亮勋等同志给予热心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译 者

1981年11月6日

本书谨献给我已故的朋友雅克·马丁，他在最艰苦的考验中，独自找到了研究马克思哲学的途径，并对我进行了指导。

——路易·阿尔都塞

目 录

序言：今天	1
说明	21
一、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	23
二、论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	30
三、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	67
四、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 主义戏剧的笔记)	107
五、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政治经济学与哲学)	128
六、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	135
七、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	190
八、关于“真正人道主义”的补记	212
附录：自我批评材料	218
第一部分 自我批评材料	218
第二部分 论青年马克思的演变	258

序言：今天

—

近四年来，我在不同的刊物上曾发表过几篇文章，这里把它们汇编成册，奉献给读者。我所以这样做，主要的、也是十分实际的理由，是其中有些文章已不易找到了。其次，这些文章尽管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但它们都包含着一个思想，把它们汇集起来，这个思想就会显得更加突出。最后，我把这些文章按其本来面目保留下来，作为反映某一段历史的文献资料。

这些文章几乎都是在某个特定场合下诞生的。有的是对一部著作的研究；有的是对批评或反对意见的答复；有的是对一部戏剧的分析，如此等等。它们都标有出版的日期，印着诞生时留下的胎记，即使有些不一致的地方，我也决定不去改动了。我删掉了一些过分涉及个人的论战性段落。少数语句、注释和章节过去为了免得刺激某些抱偏见者的感情，或者为了使论述不致过于冗长而不得不割爱，这次我都补了上去。此外，我还订正了一些引文出处。

这些文章虽然每篇都是在特定场合下诞生的，但它们又是同一个时代和同一段历史的产物。它们是一种特殊经历的特殊见证。与我同龄的、力图按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的哲学家都曾有过这种经历。历史把我们推到了理论的死胡同中去，而为了从中脱身，我们就必须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从人民阵线和西班牙战争起，历史就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吸引住了，而在真正的世界大战期间，它又使我们受到了事实的严酷教育。历史打破了我们的平静生活，并把我们这些资产阶级或小资

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改造成成为一些懂得有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目标存在的成年人。我们从历史强加给我们的明显事实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并加入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共产党。

战争突然结束了，我们立即投入到党所领导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中去。我们因此体验到了我们的选择的含义，并承受了由这一选择带来的后果。

我们今天回忆起这段时间，在政治方面那就是大罢工、群众示威、斯德哥尔摩宣言和和平运动。那时，抵抗运动唤起的巨大希望濒于破灭，千百万人开始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力求使冷战不致恶化成为战争的灾难。在哲学方面，那就是全副武装的知识分子如同围猎野兽一样地到处追逐错误，我们的哲学家不研究任何哲学，并把一切哲学都当作政治；对于艺术、文学、哲学或科学，总之对于整个世界，我们统统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来个一刀切。用一句挖苦的话来概括，那时只是漫无边际地挥舞“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这面大旗。

这个极左公式本是波格丹诺夫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口号，而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却为了使当时因李森科的“生物学”而陷入不妙处境的马克思主义免受资产阶级的狂暴攻击，又把它重新提了出来。口号提出了以后，就成了一切的主宰。我们当时所有的哲学家，在这条专横路线统治下，只能或者人云亦云，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盲目信仰，或者被迫信仰，再不然就是尴尬地装聋作哑，绝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这种狂热是在斯大林那套独断专横的统治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影响下形成的。说来奇怪，它却偏偏要由斯大林的干预才从疯狂转向一点理智。斯大林在一本小册子里斥责了有些人力图把语言说成是上层建筑的狂热。我们开始看到，使用阶级标准决不是毫无边界的。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是科学，而过去，人们却要我们把科学当作一般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退却，

而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下，必须从复习基本知识开始。

我是以我自己的名义，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写这些话的；我研究过去，正是为了说明现在和认识将来。

我回顾这个历史阶段，既不是留恋过去，也不是有所抱怨，而是为了用一种超脱历史的观点去承认历史。那时，我们年少气盛，充满了信心，敌人又毫不宽厚，总是骂骂咧咧地进行挑衅。在一段时间里，有些领导人不但不阻止我们沿着“左”的理论斜坡滑下去，相反使劲把我们朝这条路上推；另一些领导人则无动于衷，丝毫不去劝阻他们或者警告我们。这种复杂的情形使得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处于糊涂的状态。于是，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宣传鼓动上，而本来，我们在从事斗争行动的同时，理应有了解情况和进行学习的权利和义务。总之，我们甚至没有把这段时间利用起来。对于波格丹诺夫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于列宁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历史性斗争，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甚至没有读过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因为我们太热衷于在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意识形态火焰里重新发现自己炽烈的热情。我们上一辈的人，那些有责任为我们指引道路的人，他们怎么也同样过着无知的的生活呢？经过无数战斗和考验而奠定的并由许多伟大著作所体现的长期理论传统，对他们怎么都成了不起任何作用的一堆废纸呢？

我们只能承认，在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保护下，另一种消极的法国传统压倒了理论传统，这是因为法国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一贯缺少真正的理论素养。这个根深蒂固的缺点，如果套用海涅关于“德意志贫困”的说法，可以叫做“法兰西贫困”。法国党之所以在“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并赋予这种理论以激进宣言的形式，法国党之所以为此而经受了考验并表现了无可怀疑的政治勇气，也是因为法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留给它的理论遗产十分微薄的缘故。确实，除了

马克思十分喜欢提到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外，除了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蒲鲁东和对马克思主义懂得不多的饶勒斯以外，我们还有什么理论家呢？德国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早期的考茨基；波兰出现了罗莎·卢森堡；俄国有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意大利有能与恩格斯平起平坐地讨论问题的拉布里奥拉（法国那时却只有索列尔^①），后来又有葛兰西。我们的理论家又是谁呢？是盖德，还是拉法格？

我国其他方面的传统十分丰富，唯独理论传统却显得贫乏。如果要弄清其中的道理，那就必须进行一番全面的历史分析。我们这里并不打算进行这种分析，但至少可以确定几个要点。谈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工人运动中的理论传统，我们不能脱离开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是一些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这一理论的也是一些知识分子（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罗莎·卢森堡、列宁、葛兰西）。这种状况无论在开始或在后来，无论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不能改变的。能够改变和将会改变的不是他们的知识分子^①身份，而是他们的阶级出身。这里有一些根本性的原因。继考茨基之后，列宁曾对这些原因作了清楚的说明：一方面，工人运动的“自发”意识，如果任其发展，只能产生空想社会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既然需要为建立和发展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哲学而进行巨大的理

^① 当然，知识分子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作为活动家出现的、在许多方面具备空前才能的一类十分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正的学者，有很高的科学造诣和理论修养，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对这些形式的现实和变化，他们都十分熟悉，并时刻注意同这些形式作斗争，他们敢于在理论实践中进行反潮流，敢于同“官方真理”相抗衡，并且能不顾各种流行偏见的禁止和阻挠，断然走上由马克思开辟的宽广大道。如果他们对工人阶级没有清醒的和坚定不移的信任，如果他们不直接参加工人阶级的战斗，从事这种性质的和这样的事业真正是不可想象的。

论工作，这项工作只能由在历史、科学和哲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大知识分子来承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德国、俄国、波兰和意大利都出现了，有的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有的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师；这都不是由孤立的偶然事件造成的，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伦理条件使知识分子的活动简直无法进行，统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沆瀣一气，它们还得到教会的支持）往往只给知识分子以卑贱和低微的职务。在这些国家里，知识分子只有站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革命的阶级一边，才能得到自由和前途。在法国则相反，资产阶级曾经是革命的阶级。它历来善于争取知识分子参加到它所进行的革命中来，并且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夺取和巩固了政权以后，资产阶级继续使整个知识分子站在自己的一边。法国资产阶级干净、彻底地完成了自己的革命；它把封建主阶级从政治舞台上清除了出去（1789年、1830年、1848年）；它在革命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团结；它击败了教会，随后又收容了它，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在适当时机同它分离；它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把自己装扮了起来。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实力地位和历史上取得的种种其他地位，给了知识分子相当宽广的前途和活动余地，足够体面的职务，不少的自由和幻想，以便把他们笼络在它的法律之下，使他们继续受它的意识形态的控制。除了个别的伟人外（正因为他们是伟人，他们才是例外），法国知识分子接受了给他们的这种地位，他们并不感到有向工人阶级方面去寻找出路的切身需要。即令他们有人投靠了工人阶级，这些人也不善于彻底清除他们身上盖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残余就表现为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如饶勒斯）或实证主义。法国党不得不进行了大胆而耐心的努力，以消除“工运中心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工人对知识分子产生这种本能的怀疑决不是偶然

的，它反映了工人在长期历史中多次积累的经验 and 反复经历的失望。正是这样，资产阶级的统治使法国工人运动同知识分子长期相脱离，而知识分子对于形成真正的理论传统却偏偏是不可缺少的。

我是否还应该补充另一条民族性原因呢？这是因为，在 1789 年大革命以后的一百三十年里，法国的哲学史简直贫乏得可怜。从梅恩·德比朗、库辛到柏格森，法国哲学始终顽固地坚持它的不仅是保守的，而且是反动的唯灵论。法国哲学鄙视历史和人民，同宗教结成紧密的联系，竭力反对唯一值得重视的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此外，法国哲学的不文明和无知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最近三十年来，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但是，一百多年以来官方哲学的愚昧思想是个十分沉重的包袱，它窒息着工人运动中的理论努力。

法国党是在这种理论空白的情况下诞生的。虽然如此，它从我们唯一的和真正的民族传统中，即从马克思曾表示无比钦佩的政治传统中吸取了营养，尽量克服了存在的缺点，并终于成长了起来。它始终带着这一政治传统的烙印，因而有点看不起理论的作用，看不起哲学理论比看不起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更要严重。虽然法国党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主要是些大作家、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和自然科学家，还有少数几位高水平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且政治原因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具有足够的哲学修养，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政治学说、一种分析和行动的“方法”，而且作为科学，它是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所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的理论领域。法国党就是在以上条件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没有建立起民族的理论传统，得不到民族理论传统的帮助，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它没有一个能够造就出理论大师的理论学派。